



China news digest -- chinese magazine(cnd-cm)

• — • — • 中国新闻电脑网络 (CND) 主办 • — • — •

—— 增刊 第二六八期 ——  
(二〇〇一年八月二十日出版)

---

本期目录 (z k 0 1 0 8 b)

---

【学术争鸣】中国精英主义者的文革和人类漫漫征程中的文革	老 田
“文革”究竟好不好？	徐友渔
揭一揭主流精英主义者的老底	
老 田 对《徐友渔：“文革”究竟好不好？》一文看法	
一 听 文革果真那么好吗？	
秋 风	
“反思文革”还是“妖魔化文革”？	佚 名
【往事追忆】一九七六年合江纪事	多 元
难忘 1 9 7 6：四人帮被揪出来了	季思聪
【史海钩沉】“周总理遗言”案	佚 名

---

小启：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厅”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参观。

《文革博物馆》网址：<http://www.cnd.org/cr>  
请致函 [cnd-info@cnd.org](mailto:cnd-info@cnd.org) 获取订阅《华夏文摘》增刊资讯。

---

#### 【学术争鸣】

中国精英主义者的文革和人类漫漫征程中的文革  
• 老 田 •

#### 一、对于文革的基本判断

中国精英对文革具有整体的黑暗记忆，是具有充足理论和事实依据的，而毛泽东也一向宣称要旗帜鲜明地为人口的 9 5 % 服务。中国精英说亿万农民和他们完全

一样，对毛泽东时代怀有深刻的仇恨和憎恶，是没有理论和事实根据的，穷人和富人的看法永远有区别。中国精英们把文革说成是一种毛泽东时代中国的“常态”，或者是说成具有典型代表意义的历史时期，则是精英们另外一个喜欢使用的逻辑。这种逻辑从否认毛泽东对国家安全形势的判断出发，否定中国当时有进行国家总动员的必要，进而否认中国社会确实已经进入动员状态。实际上精英们简单否认过国家动员的必要性（笔者到今天也没有看到关于这一点的认真深入的分析），但是迄今为止笔者尚未见到“文革确实是和平建设时期”的有力论证。把文革归结为（或者有意混同为）和平时期的论点，不仅见于正式文件（《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而且也是精英们的共同理论偏好。从这样的心理幽怨出发，文革不可能不被剥离掉具体的历史条件，不可能不被归结为某种个人因素或者是理论认知错误，不可能不落入“英雄创造历史”“坏人祸害中国”的套路。当然应该承认这在中国道德主义作为核心源流的文化中，是一种再正常不过的简易办法，“坏人不会干好事”是一个铁律，批判坏人当然具有道德优势地位和异常的杀伤力，能够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这样一来人数最多的农民就非常必要与精英主义者保持认识一致了，姑不论事实如何，首先是理论需要农民同志，更何况毛泽东这样的坏人怎么可能为农民干好事呢（这在理论上说不通）？如李泽厚所系统论述过的“毛氏斗争哲学说”、“马列主义民粹化”就比较具有代表性；而流行的媒体论调，说文革是“挑动群众斗群众”、“向刘少奇夺权说”就基本属于骂街性质，虽然在现实中为自觉和不自觉的精英主义者所乐意信奉，但是在理论上不值一提。

## 二、高人的“现代化高见”与农民的“目光短浅”

笔者刚好与文革同岁，谈不上是文革的既得利益者，小时候就是穿着破衣服吃着咸菜长大的。笔者的母亲是富农的女儿，但是她和我的许多父老乡亲一样，有充足的理由相信我的一辈子会比他过得好。今天虽然农村许多人家的境况不比当年更糟，但是基本上再也没有人自信到说他的儿子会生活得更好了。因为今天农民的长远利益和整体利益（如水利工程、土地平整和改良等等），再也没有人愿意去为此费心和费力了，再也不可能在什么工地见到和农民老大爷一起抬一整天石头的省长县长了。

1997年世界银行公布“人文发展指数”，根据得分情况，中国排在南非之前。主要就是靠教育指数（得分0.78）和人均预期寿命指数（得分0.75）拉高的，这两项指标在最近的二十年中，由于学费的急剧上涨和合作医疗强制停办，反而有相当的退步；若任其发展下去，农村儿童入学率长期下降，可以指望在几十年后中国成人识字率和印度持平。精英们所极力称道的经济发展成绩，在二十年的超常规发展之后只得0.57分，是扯后退的项目。今天由于化肥的急剧增加粮食产量有所增长，如果认为这就是决定一切的东西，农民恐怕不能同意，当然精英们可以闭上眼睛认定农民唯一的需要就是有饭吃。对多数人有益的事情，今天物质和技术条件比当年都好得多，为什么反而办不成了呢？

说到三年困难时期，农民特别是南方地区的农民是有意见的，因为如果不管黄淮海平原和北方农民的死活，他们本可以不必那样挨饿的。精英们有意见就更加理由充足了，据笔者所知，这是中国历史上唯一的一次精英在整体上和底层民众共同挨饿的困难时期，精英们把三年困难时期说成是“人祸”和“制度导致”，是有充

份理由的，在老蒋时代难道他们也会整体上和普通民众一样吗？中国精英几乎毫无例外认为现代化是中国的唯一的出路，进而否认中国农民的“丰衣足食”愿望的合理性和可行性，欢迎实际上的“超英赶美”（或者说成与国际接轨），痛恨毛泽东时代的平民主义工业产品战略。工业产品的“高精尖”和国际接轨的结果，经过最近二十年的现实现在我们已经看得很清楚，农民是搭不上与国际接轨“这一班车”的，因为“这一班车”的座位和空间都需要物质资源的支持，9亿农民连“站票”都买不上。拒绝放弃不切实际的现代化白日梦，如果有5—6个地球供地球上60亿人口生息，大概中国精英的白日梦就有希望实现，但是非常遗憾的是只有地球一个。不管是松下幸之助在街头感悟到的“自来水哲学”，还是马克思周密论证的“物质财富充份涌流”，看来都是无法成为现实的；至少也是在人类彻底放弃“消费主义”和“精英主义”之前，是无法实现的。在这两种法力无边而且吸引力多多的主义面前，地球资源永远赶不上人们日益膨胀的欲望，就像我老家农民所常说的“人心不满百，当了皇帝想外国”。虽然在中国农民甚至是精英主义者看来，欧美日诸国富得流油，但是他们仍然孜孜以求。大概人类最终必须回到与自然和谐相处，所以高人会最终放下架子和优雅的思想，去向农民看齐，实现李泽厚所憎恶的“知识分子农民化”。即使平均主义不能实施，也许过份的两极分化和畸形发展也必须主动抑制，也许有限的资源必须首先向全人类的基本生存和基本福利倾斜。

### 三、究竟谁应该妥协，是精英还是平民

文革这样一个时期，即使没有当时的特殊情况，也仍然在人类的漫漫征程中具有光辉的启示性意义。精英主义和消费主义必须主动抑制，个人利益和奢侈需求不能比整体利益和基本生存需要更加优先，极端的个人主义也必须主动抑制。

在西方的崛起过程中，发生过两次重要的世界性的“西式乐观主义”。第一次发生在十九世纪末，笔者称之为“欧式乐观主义”（托夫勒称之为“第二次浪潮”），这一次变化的结果是在世界范围内撮取工农业“剪刀差”成为可能，西方开始在资源利用和财富集中上全面超过世界其他地区，社会财富分配发生了从金字塔尖下流现象，富裕阶层开始扩大。第二次西式乐观主义还在进行之中，大致上起源于1980年代，这一次笔者称之为“美式乐观主义”。这一次的乐观主义是因为计算机和其他智能化技术的进步，西方赢得了以技术垄断为基础的空前的垄断地位，财富转移得以以前所未有的规模进行。如果说仅仅是技术本身就导致这样的结果那显然是不全面的，西方国家从1980年代也开始放宽法律限制，大力地促成大公司进行并购，以进一步加强其在世界市场上的垄断地位；而且配合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向第三世界国家全力兜售“小政府主义”，消灭对跨国公司的最后威胁力量，应该指出中国的精英主义者在这个过程中也是摇旗呐喊功不可没；同时苏联的及时解体、东欧的转向和中国的不设防的开放，客观上使得西方大公司获得了一轮（大概也是最后一轮）新的攻城略地的扩张机会。西方尤其是美国怎么可能不繁荣。这两次西式乐观主义本质上都是经济变化和财富的区域转移，但是“富家多所宜、咳唾自成珠”，有钱就是有理。两次西式乐观主义的结果都在世界范围内导致社会思潮的整体向右转，恩格斯的关门弟子考茨基和伯恩斯坦在“欧式乐观主义”中，成为现代修正主义的鼻祖。而苏联的“新思维”和中国的“总设计师”，也不能说是辜负了好时代。中国1984年《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发布以后，小平同志就两次荣登美国时代周刊的封面，其中一次下面配发的大字标题

是“中国背弃了马克思主义”。考虑到《决定》只是提一提什么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自我发展，中心环节是要搞活大中型国有企业，美国人这样的论断真是够大胆的。结合九十年代国有企业开始出现频繁的全行业亏损甚至是总体亏损，十五届五中全会痛下决心提出“退出战略”，真不能不佩服美国佬真他妈的见微知著，搞资本主义经验丰富。

认识的统一不能说不是一件好事，但是问题终归是要在现实中才能得到解决。只要走出精英主义和消费主义的藩篱，现实就难以叫人乐观，资源没有增加，而且离支持日益增长的人口实现现代化的需求越来越远，共同的富裕和发达是没有指望的，而资源的分配在新的西方繁荣中更加向富人倾斜了。无论在中国还是在世界上，富人和穷人的距离更加大了。西方的成功只是提供一个无法学习的假榜样，穷人不可能都变成富人，只有少数人能够变成富人，因为地球只有一个，资源不是无限的。李泽厚所梦想的“工农知识分子化”是没有出路的。

#### 四、如果精英主义需要抑制，用什么来抑制

舆论控制、经济控制和司法控制一直是三大社会控制手段。在毛泽东时代，经济控制无法实施，因为需要进行高积累，人们的收入已经被压制到生存保障线的水平上，这样再进行经济剥夺就成了生存剥夺；司法控制的条件也不好，而且司法体系本身就是精英主义者的天下，西方的司法体系也一样无法有效抑制精英主义。所以舆论控制手段几乎成为唯一的社会控制和国家管理手段，舆论控制若要取得实效，就要求被管理者敢于进行“逆向管理和监督”，这就是“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的实质；而且防止管理者对这种逆向管理的反感和报复也是必须的；而舆论控制本身的非专业非精确特征，也要求舆论控制的结果不能够精确应用和作为唯一的依据；所以根据老毛的总结，舆论控制的特点和规则有以下三条：一是言者无罪、闻者足戒、二是有则改之、无则加勉、三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总而言之，舆论控制最后必须以“大民主”和群众运动方式进行，而且在三种社会控制手段中也只有舆论控制能够比较好地抑制精英主义，而不会被精英主义者所利用，反过来制造精英优先，而经济控制和司法控制就可以被精英所利用。应该如实承认舆论控制是不公平的，而且是专门针对精英（地富反坏右）的，精英主义者对“大民主”式的舆论控制的恐惧心理是有现实根据的。而且由于舆论控制的不规则性，甚至具有一定的突发性，精英阶层对文革具有整体黑暗记忆，也大体上符合事实的逻辑（而非事实本身）。精英主义者喜欢把这种特殊阶层的黑暗心态说成是全民感受，则是出于捏造和妖魔化。实际上文革的秩序消失，给了精英以非常机会，许许多多的精英非常努力地把握了这一机遇。直到今天北大许多当年的文革积极分子，再一次成为改革时代的积极分子，为改革鼓与呼。当年动手打人的今天是名教授和学科带头人，北大的朋友评论说“这些人不是等闲之辈，是‘人精’和‘人尖子’，无论在老毛还是老蒋时代，他们都一样能够脱颖而出。和他们的人品相比，聂元梓并不是最坏的”。实际上文革的重灾区就是这些“人尖子”集中的地方，如文化部特别是文联的相互攻讦和揭发，简直是文革的经典，还有大学和科研机构。文化大革命确实是一面“触及人们灵魂”的照妖镜，终于让人们看见人性中的自私、丑恶和卑鄙，这大概是精英们在对文革的恐惧心理之外的另一种最重要的心理感受。梁晓声就公然宣称是“和婊子混了几年”，很显然不容易在他那里寻求到正确答案的问题是“谁才是真正的婊子”。最常见的状态总是把责任推卸给别人，宣称自己是受害者。一些新

右派人士和伤痕文学作家，就明显具有这样的心路历程。

毛泽东时代的中国确实是“不合格的社会主义”，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提到基督教的社会主义和封建的社会主义的特征——简单的禁欲主义和粗陋的平均主义，在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倒是十分突出。实际上毛泽东时代确实不是西方左派的路线，也不是新右派所攻击的封建主义和法西斯专政，而是中国古圣先贤“复三代之盛”理想的实践。在毛泽东时代，不仅根除了盘踞在农村社会中上千年之久的宗法势力，而且基本从整体上消灭了社会丑恶现象，危害中华民族上百年的大烟毒害被迅速根除，妓女消失，性病也被消灭，并提醒人们要时刻提防人压迫人、人剥削人的制度复辟，这一切无不体现了中国几千年来，仁人志士所梦寐以求的接近于大同理想的“小康社会”。这种社会不是任何意义上的经济境界，而是一种道德境界。毛泽东时代的晚期，基本上达到了岳飞所说的“文官不爱钱、武官不怕死”的“天下太平”境界。

笔者孤陋寡闻，不知道也不能想象世界上存在：不是大民主方式和大批判运动形式的抑制精英主义的有效方法、不是道德主义和舆论控制形式的抑制精英主义的方法。如果有的话，大概也只有精英主义者自觉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而这一道路不仅精英主义者不愿意走，而且事实证明被强迫走过一段“与工农相结合道路”的中国精英，至今仍然怀着对毛泽东的刻骨仇恨在反攻倒算。正是因为主动协调的方式看来不可指望，被动方式的必须性是显而易见的。而由于对精英主义者监督不是那么容易实现的，在利益关系日益复杂的社会条件下，在利益牵连日益脱离社区范围的情况下，民众进行舆论监督的局限性和困难也是非常大的。毛泽东的难题是全人类所无法回避的共同难题，相比较而言，文革时代的成就还是在现实中所能够实现的比较理想的成就。

∞ ∞ ∞ ∞ ∞ ∞ ∞ ∞ ∞ ∞

“文革”究竟好不好？

• 徐友渔 •

在进入 21 世纪的今天谈文化大革命，意味着中国人告别那场噩梦已经快四分之一一个世纪了，人们多半会不假思索地把它称为十年浩劫，说它使中国的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

但现在突然有人著书立说（见《读书》今年第一期：《书写历史：〈高家村〉》），称以上看法是“精英们制造的历史”，据他自称站在贫困农民的立场上写的历史，文化大革命却是教育、文化、卫生、体育等各方面达到最好的黄金时期。作为文革的经历者和研究者，我倒想和这种看法辩驳一番。

如果要辩论的话，作者已经把自己放到了极其有利的地位：他说的是自己居住了 23 年的村庄的事，他只是说高家村的历史证明文革好。谁有那功夫去高家村住上 23 年，再来摆事实、讲道理？幸好，作者还是道出了他的理论立场：“写历史从来就不是把事实找出来然后记录下来，因为世界上没有不包含理论假设的事实……对同一个事件不同的人由于出发点不同会写不同的历史。”看来，我和作者还是有一点共识：对同一件事，立场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解释。

作者说：“‘文革’是教育的最好时期，因为正是在这时高家村第一次办起了一至三年级的小学。于是这个村历史上第一次全部学龄儿童入学。”这不禁使我想起，文革中隔三差五地宣传“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把南京长江大桥的建成、成（都）昆（明）铁路的通车、氢弹爆炸成功等等都归功于文革。但事实上，这些事情是早就可以完成的，是文革使计划的完成一拖再拖，经费再三追加，工伤事故恶性加剧。作者为什么不反过来问一下，为什么建国近20年，高家村竟然连小学都没有呢？我们不是一直在说“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吗，作者不是反复讲文革前的“毛泽东时代”如何使教育水平提高了吗？除非你认为高家村的人只配当文盲，儿童能读一至三年级纯属锦上添花，甚至皇恩浩荡，才会把这件事当成文革的伟大成果来宣传。我疑心作者确实持有这个标准，因为他说，高家村的村民“不觉得他们理所当然地得过好日子”。说到这里我想起我下乡时（1969年，正值文革期间）见到农民一贫如洗的震惊，但开忆苦思甜会时，一个老农妇歌颂“幸福生活”竟说：“感谢政府每年发一丈布票给我，使我有衣穿。”

提起忆苦思甜会还使我想起，开会前书记使劲打招呼：“这次是忆1949年之前的苦，千万别忆成1962年的苦！”但几乎每个老农都要说到公社食堂化时期他们吃不饱，饿死人，说这是刘少奇使他们受苦了。只是文革之后我们才知道，正是刘少奇为矫正大跃进、人民公社的错误，触怒了毛泽东，使他在文革中被打倒。可见，吃不饱是农民的亲身经历，不会错，但对事实的理解和解释，农民却可能大错特错。现在，作者说高家村的人认为文革有多么好，是每个人都这么说，还是一些人这么说？说这种话的人明不明白文革是怎么回事？有没有可能，是作者把自己的观点强加在农民头上？

作者把文革说得样样都好，而把改革开放分田到户说成是“不伦不类的私有化”，对提高农民生活毫无助益。我倒想和作者打个赌，问问高家村的农民：“你们愿不愿意把分到手的土地交回去，重过‘一大二公’、学大寨的日子？”这位自诩为站在贫困农民立场的人，敢和我赌一把，拍胸脯说乡亲们一定愿意回到文革，回到他所谓的“毛泽东时代的黄金时期”吗？

∞ ∞ ∞ ∞ ∞ ∞ ∞ ∞ ∞ ∞ ∞

揭一揭主流精英主义者的老底

• 老 田 •

在中国最近的二十年里，昧着良心说假话，睁着眼睛说瞎话反而成了一种时髦，成了一种政治正确性。笔者坚决不相信中国精英主义者，真能够鼓吹出新式真理和真的能够颠倒黑白，所以决定揭一揭主流精英主义者的老底。

徐友渔先生在《文革究竟好不好》中，假话瞎话不少，兹举三例如下。据笔者所知，徐友渔出生于1957年，而且下过乡，后来当过工人（招工回城？），1977年进大学。以徐友渔先生这样的资历，是应该有机会有能力了解笔者所列举三个事例的事实真相的，所以完全能够断定徐友渔是在说假话和瞎话。

一、“一丈布票”里的乾坤

徐友渔先生言道“说到这里我想起我下乡时（1969年，正值文革期间）见到农民一贫如洗的震惊，但开忆苦思甜会时，一个老农妇歌颂‘幸福生活’竟说：‘感谢政府每年发一丈布票给我，使我有衣穿。’”

从1890年代，晚清状元张謇在长江口附近创办大生集团算起，到1949年中国解放，中国近代纺织工业发展了50余年。当时笔者老家蕲春县某乡第15保，共计有十几个自然村落2000多人口，能够穿“洋布（机织布）衣服”的人家，我母亲伸出一只手可以全部算上。

从1949年到1976年毛泽东逝世，合计27年，当时采用的是重工业优先的发展战略，即在建设纺织厂之前首先建设纺织机械厂的战略。笔者的老家某公社六大队四小队合计200多人口，仍然穿土布衣服的人，已经不到5个。

布票对徐友渔笔下的“老农妇”而言，确实意义重大非凡。若没有这一丈布票，为了蔽体御寒，“老农妇”必须自己来织这一丈布，从纺线车纺线，到用老式穿梭织布机织成土布，即使是熟练的“老农妇”也需要500—600小时，那就意味着，“老农妇”在照顾小孩做完家务以后，每天必须忙到三更天，为织成这一丈布至少也需要100个以上的“夜工”。这还没有考虑，以前做饭是需要“老农妇”自己，把“谷”变成（通过石碓、石磨等）“米”的。

当然应该承认老农妇这一丈布票，对中国的精英主义者不那么美妙，这不仅意味着精英主义者没有穿“与国际接轨”的高档衣服的可能，而且由于在布票面前人人平等，我们的精英主义者恐怕还免不了，要穿与“老农妇”一样质料的打补丁的低档衣服。毛泽东时代的平民主义战略里面，确实不曾为精英主义者开小灶搞特殊。

## 二、精英主义者会妨碍什么？

“作者为什么不反过来问一下，为什么建国近20年，高家村竟然连小学都没有呢？我们不是一直在说‘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吗，作者不是反复讲文革前的‘毛泽东时代’如何使教育水平提高了吗？除非你认为高家村的人只配当文盲，儿童能读一至三年级纯属锦上添花，甚至皇恩浩荡，才会把这件事当成文革的伟大成果来宣传。我疑心作者确实持有这个标准，因为他说，高家村的村民‘不觉得他们理所当然地得过好日子’”。

笔者始终认为，不在中国大地上扫除精英主义，就不可能真正动员社会资源用于为人民大众谋福利。非常不幸的是，这样“错误”想法是被近二十年来，中国在精英主义者主导下的实际表现所证实所发展。

1972年，笔者开始上小学，除了学生足够多以外，其他的一切办学条件，举凡合格的教师、校舍乃至教材都极为欠缺。但是就是在那样的情况下，笔者老家和笔者同龄人没有一个不识字的，而且只要是本人愿意，一定可以一直念到高中毕业，学费不仅极为便宜，而且也可以无限制赊欠。今天，所有的办学条件都远胜当

年，但是笔者当年就读的一所中学，因为合格生源（交得起学费）奇缺已经关门。还有合作医疗制度也是一样，只要是有利于多数人但是不利于精英主义者集敛财富的制度安排，都会被废弃。

不管对中国的长期发展带来多么不利的后果，中国精英主义者都决不会发善心的。在经过文革的风雨之后，合作医疗和普及教育能够在中国大地生根，决不是偶然的；相反在精英主义成为中国主流意识形态之后，全民教育和合作医疗如果还能够现实中存在下去，那才真是咄咄怪事。

### 三、路线分歧不存在？

“只是文革之后我们才知道，正是刘少奇为矫正大跃进、人民公社的错误，触怒了毛泽东，使他在文革中被打倒。”

精英主义者虽然聪明，但是要编造脱离事实的谎言，也不总是那么容易自圆其说。徐友渔先生既然知道“对同一件事，立场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解释”，也不会不知道自己在一个什么样的立场上，既然是这样，后面又来一个什么“赌一把”就实属不智了。

刘少奇不幸已经死了，无法证明自己在没有毛泽东掣肘的情况下，将会做何种路线选择。但是邓小平同志后来的选择做出了有力的佐证。1981年《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发表以后，苏联的勃列日涅夫在中亚访问时，感到欢欣鼓舞在塔什干发表声明说“对于中国同志的结论，我们再也没有需要补充的了”。1984年《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出来以后，邓小平同志两次荣登美国《时代》杂志的封面，其中一次下面配发的大字标题是“中国背弃了马克思主义”。徐友渔先生大概不会认为，苏联的勃列日涅夫和美国时代周刊，和毛泽东合伙，前赴后继地“污蔑”小平同志，是“走修正主义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第二号当权派”吧。

最近有人在改革中受益最大的城郊菜农中间做过一次小范围的调查，有89%的农民赞成毛泽东当选为国家领导人，赞成邓小平的也不少，达到11%。在农村中固然是这样，在城市情况也不会更好。根据笔者这些年在社会上的接触和了解，城市中工人特别是下岗工人，持何种政治态度自不待言，即使在企业家这个阶层中，真正广泛认同邓小平的只有一点——那就是容许私人办企业。在其他的宏观政策上基本是上持整体否定态度，从金融服务体系到国家产业政策，从地区平衡发展到外贸体制，莫不大有微言。毕竟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能够比精英们看得多看得远。

在中国只有一个阶层的绝大多数，对毛泽东时代的评价持一边倒的诋毁，这就是中国的精英主义者阶层。中国精英主义者中绝大多数都是西方的新自由主义的狂热信徒。新自由主义在西方向来也只是一种“私货”，从来没有成为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和主导过西方国家经济政策。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新自由主义逐渐有了一种新地位，不仅成为西方大国通过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贸易组织，向落后国家推销“小政府主义”为跨国公司不受限制地落实“垄断优势”开道；而且



新自由主义明显是美国中央情报局钦定的、对苏东和中国进行和平演变的思想资源。

□ 二〇〇一年四月十二日

∞ ∞ ∞ ∞ ∞ ∞ ∞ ∞ ∞ ∞ ∞  
对《徐友渔：“文革”究竟好不好？》一文  
的看法  
• 一 听 •

就事实而论，文革确实主要是乱了城市和它的周边地区，农村与人民公社化、大跃进、“四清”时期相比，反而平静了许多。人们的注意力，集中在城市，农民获得了喘息的机会，田里反倒葱绿起来了。

我想凡是了解66、67年农村情况的人，都不能不承认这个事实。

对农村的破坏，大跃进、四清比文革严重得多。

但68年随着城市动乱的退潮，那些文革的受益人，可以腾出手来顾及农村时，农村开始遭殃了。主要是“清理阶级队伍”以后，以广东为例，1968年以后，才开始出现“把毛泽东思想送下乡”运动，这些披着一身硝烟的革命师生，下乡头一件事，就是“把伟大领袖毛主席像请到贫下中农家里”。给贫下中农送忠字品（即写着语录、忠字之类的东西），送红宝书《毛主席语录》，帮助贫下中农布置“三忠于”环境。仅一间中山大学，就向贫下中农送出了2.4万多件忠字品，1.8万件宣传品，布置了239间忠字室。许多院校还帮助生产队建立早请示、晚汇报、天天读制度，开展唱忠字歌、跳忠字舞活动。农民从此不得安宁了。

对农村的破坏，可以从下面几个方面看到：

一、并社。并社有两种并法，一是取消大队，并大生产队，实行二级管理。肇庆专区四会县罗源公社，全社有94个生产队，并为26个，撤销大队一级。怀集县诗洞公社把334个生产队，并为18个，直接由公社领导。另一种是并大大队、并大生产队，维持三级管理。罗定县罗镜公社把793个生产队，合并为276个之后，大的生产队达543户。

二、改变核算单位。一是实行大队核算，韶关专区7个县的统计，实行大队核算的有250个大队，连南县68个大队全部改为以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二是取消大队，以并大后的生产队为核算单位。三是有些地方实行以公社为基本核算单位，如韶关专区的连山县，9个公社中有两个以公社为核算单位。此外，四会县清塘公社撤销生产队，恢复大跃进时期的连、排编制，以连为核算单位。

云浮县前锋公社红岗大队19个生产队，改为大队核算之后，队队表忠、献忠、比忠，把生产队的财产无偿交给大队。富队献出厂场、生产资金和储备粮，穷队不甘落后，赶种麦子、蒜头、蔬菜，献给大队。

三、实行供给制。各地提出的供给制项目，包括粮、油、盐、糖、柴（草）、医（疗）、学、生（育）、葬、衣服、理发、电灯等十几种。多数地区实行粮、油供给。东莞县清溪公社长山头大队实行了8项供给，由大队统一分配，取消工分，实行等级发薪，粮、柴（草）按需分配。

四、实行工资制。东莞县石碣公社横窖大队从7月1日起，实行工资制，社员按“三忠于”表现和劳动强弱、劳动态度等条件，评为20个级别。一级为20元，20级为2.5元。一年发4次工资。

五、属社员所有和使用的房屋、厕所、自留地、开荒地、饲料地、“五边”地、自留果树和私养耕牛，一律收归集体。曲江县有119个生产队社员房屋归队；湛江专区徐闻县有4000头私养耕牛无偿交给集体。

六、队办食堂。曲江县有37个生产队，又办开了人见人怕的集体食堂。

七、集体生产的农副产品不上自由市场，统统卖给国家。许多地方把它作为忠不忠于毛主席的一条标准来对待。

八、取消“公有私养”生猪，改为“公有公养”。

九、无偿交余粮。农民称之为“献忠字粮”。湛江专区阳春县潭水公社，一下子献出了9万公斤忠字粮。惠阳专区有的地方献“三鸟”，向毛主席表忠心。

所有这一切，足以令农村经济重新走向破产。

另外就是清理阶级队伍，以广东惠阳专区为例，1968年10月前后，整个专区揪斗了10.63万人，其中作敌我矛盾处理的4.4万人，作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的3.08万人，未有确实材料定性的3.13万人。破获了28个反革命集团，抓了754人，是前3年破获反革命集团案总数的1.5倍。

文革对农村的影响，是从68年开始变得严重。

□ 摘自《天涯之声》2001年4月1日

∞ ∞ ∞ ∞ ∞ ∞ ∞ ∞ ∞ ∞ ∞

文革果真那么好吗？

• 秋 风 •

中国人常常批评日本人不能面对历史真相，并总是引用德国人反思纳粹的榜样来说服日本人，那么为什么不用德国人的榜样对照一下自己呢？我们对我们的历史又作了多少反思（先别管深刻不深刻）？比如就说抗日战争，有多少历史之谜尚未揭开？民族的创痛和摆脱殖民地的喜悦，又有多少反映在我们的学者的笔端？多少年了，我们的现代史不仍然是充斥空洞的说教，更不要说对大量关键性事实真相的有意掩盖。

同样，对于文革，这个历史上少有的“人间灾难”，中国人又做了多少反思，号称是社会良知的知识分子是否对此作出过对得起良知二字的思考？当然，我们不思考是因为有人不让思考。当局提出全面否定文革，自有其策略的考虑，主要是由此而限制一切更深入的研究和思考，因为如果研究下去，你就会发现这是个政治制度的问题，而不是什么个人的道德或失误的问题，则问题就比较严重了。

不过，今天我们终于有人反思了，然而，却是从一个出人意料的角度，即要为文革歌功颂德，这可真是历史的讽刺。

当然作者自己觉得有充分的理由做这种正面的叙述，而且作为一种民间而非官方的叙述，多元化也是不可避免的，因为那完全是个人经验的回忆。从个人经历来说，即使你不是文革中的既得利益者，也可能觉得那是一段美好的时光，这是有可能的；在整体的混乱灾难当中，局部的高家村可能发生了好的变化，这也是有可能的。更不说南京长江大桥、卫星上天之类的树碑立传的大工程了，那多少年来都是人们自豪的资源。

然而我们需要问：这种好的变化跟文革有必然的联系吗？文革是一种政治事件，而那段历史并不能被政治事件所全面涵盖，当时人们的生活并不全是由文革所规定的，历史、人性毕竟还有自己的某种逻辑，比如经济，它总有发展的冲动——自留地解决了当时农村的大问题。比如我天天上下班经过一条马路，春天到了，马路边上的草绿了，花开了，可是这种现象跟我有直接的因果关系吗？这个例子不太恰当，那么换一个例子，我们能说陈景润研究哥德巴赫猜想也是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就吗？我觉得这是一种相当天真的历史观，这些人士认为，政治事件（甚至是某一领袖的意志）可能决定一切，不，简直是全面地决定着一切的一切。

一切果然都是文革所带来的吗？假设历史没有现实的意义，但可以帮助我们思考问题：我们可以假设，如果没有文革（其实还应该加上多年的文革序曲，文革并不是忽然降临人间的），那些美好的东西是不是也可能发生，而且可能更加美好？

我们知道，文革是一种被动员的激情下的扭曲行为的大爆发，是一种违反人性、违反自然人性的社会事件，那么，如果我们实行的是顺乎自然的制度安排，我们是不是会更幸福？事实上，日本差不多跟中国同时开始从战乱中恢复，结果当然在哪儿摆着呢，用不着我说，日本的高家庄肯定比中国的高家庄更人幸福，那么他们该感谢谁呢？。

在任何时代，一个人的生活不可能全部是政治性的，在一个政治扭曲的时代，他的其它社会属性却未必就不起作用了。因此，如果某人对于其它人眼里的苦难时代产生了美好的记忆，那么他也许不应该（仅仅）感谢那个时代，而应该感谢他自己，或他的父母，或者是他的身份，他的单位，等等，感谢他们在那个普遍的苦难时代能够发现快乐，这些都只是个人的体验，轻易地扯到宏大的社会背景，未免太把自己当成人物了。就好像你最近发了财，就感谢党的富民政策一样地可笑。要知道，我们的奥运冠军现在也不说感谢党的领导、感谢人民的培养这类莫名其妙的话了。

我的看法是：当你从民间的角度叙述历史的时候，应该非常谨慎地区分个人的经验和历史事件，不要輕易地在两者之间建立起过于直接的因果关系。

这个观点还应该继续细化：在一个反人性的社会运动中，如果你直接受到冲击，享受到负的幸福（苦难），比如被纳粹杀害，在文革中受迫害，那么我们可以在个人被迫害的经验与政治运动之间建立起完全正当的因果关系，因为显然易见，根据我们的常识，在一个正常的社会中，我可能被谋杀、可能被汽车撞死，但独独不可能被戴上某个罪名而未经法律程序就迫害致死。

然而，在一个反人性的社会运动大背景下，个人却依然能够获得改善，享受到某种生活的快乐（排除非法的既得利益者和受虐待狂等情况），在改善和社会背景之间却并不能建立起直接的因果关系，说我之所以改善了，是因为这个扭曲的社会也不错；这种说法显然是荒谬的，因为同样根据我们的常识，在任何情况下，我们个人都在努力追求改善自己的生活，追求幸福，因此，如果一个社会能够提供这样一种框架让我们追求自己的幸福，那么，这个社会就是一个正常的社会，一个社会本来就应当如此，惟有如此，它才具有合法性，才是一个现代文明社会；而如果一个社会不能提供这样一个框架，那么这个社会就是一个恶的社会，它本身的存在就是反人类的，不人道，因而是没有合法性的，毕竟在我们之外存在着很多合乎人性的社会，我们可以通过制度对比察觉到自己所在社会的不合法之所在。而在这样的社会框架中，我无视社会的不合法的规则、甚至违反它而追求自己的幸福，就是合法的。因此，我之所以幸福并不是因为社会如何地善，而恰恰相反是因为我背弃了这个不义的社会。比如，文革中大搞投机倒把的人们，才是哪个时代的英雄；农村中秘密分田地的人，才是解放农民的好汉。如果他们由此而过上好生活，那恰恰因为他们逾越了不合理的规则的缘故。

至于说到文革中的赤脚医生、大办教育等等制度，这些制度果真就如此地美好吗？

即使这些制度非常美好，然而这种制度是否必然只能出现在那种时代，而在别的时代根本不可能出现？我认为这种判断中间仍然存在着方法论的误区。是不是文化大革命本身的逻辑内在地包含着赤脚医生、大办教育等等制度（从而我们可以在两者之间建立起直接的因果关系），或者这些制度只是当时扭曲的环境下社会自身进步的一种表现？或者说是尚有些理性的人们用当时的话语空间中所能找到的最好的实现社会福利而不是社会资源浪费、因而也是迫不得已的办法？而如果没有这种大背景的限制，这些制度本来能够以更好的形式表现出来？

有些人也把八个样板戏奉为红色经典，并将其成功完全归功于文化大革命，然而我们为什么就不问一下：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我们是不是有更多经典？色彩更丰富的经典？难道中国的知识分子只配在强权的高压下才能创造出所谓的现代经典？我们是否可以换个角度观察这个问题：在那个荒唐的年代，还想做点事情的知识分子没有任何发挥起天赋的机会，只能无奈地利用扭曲的意识形态所能提供的那么点自由创作的空间，希望维持艺术传统于不坠，然而却并不能完全挣脱当时的意识形态，因而作品表现出来也是扭曲的；因此他们创造出这些作品，并不是因为文革

多么伟大，相反它只能说明文革多么丑陋，因为本来他们能创作出更好的作品。这些作品代表着他们的最低水平而不是最高水平。

事实上，这些好的制度在当时的大背景下也遭到了扭曲了，比如学校课本中那些完全政治化的内容到底能传播多少知识？没有了赤脚医生，农民果真就不看病了吗？起码在我的家乡（西北贫穷的地方），并不缺乏乡村医生。市场自然地会满足每种需求。

当然可能目前的某些制度并不如当时的制度更合理，然而这却并不能说明文革中的制度就是好的制度，因为人类制度创新的能力是无穷的。我们也许还没有找到的好的既合乎人性（不是强迫）、又能满足农民医疗需求的可以替代赤脚医生制度的办法，但这并不足以证明，赤脚医生制度就是唯一适合农村的医疗制度，更无法由此证明文化大革命就是多么美好的时代。因为那个时代的所谓的好的制度完全是通过政治暴力强加的，而不是民众通过市场自愿选择的，因而它从其根源来说可能就是恶的。

□ 2001年3月31日

∞ ∞ ∞ ∞ ∞ ∞ ∞ ∞ ∞ ∞ ∞

“反思文革”还是“妖魔化文革”？

• 佚名 •

文革至少已经过去了二十多年，中国进入了二十一世纪，面临着众多的新问题和机遇，但是文革这个话题却依然没有被人们淡忘。一些人在用新的观点阐述文革，希望能从中发现一些必然因素；另一些人则是坚决反对文革，其中一些极端的人甚至将文革与纳粹联系起来，将一切污水都泼到了文革和毛的身上，其中包括很多不实之词。这些人已经不是在“批判文革”了，而是在“妖魔化文革”。

## 一，妖魔化文革的悖论——身边的赫鲁晓夫

发动文革的一个原因，就是防止中国出现赫鲁晓夫式的修正主义人物。赫鲁晓夫这个在斯大林生前“紧跟”、“崇拜”的人，在斯大林死后，突然抛了出所谓的“政治报告”，将斯大林全盘否定。刘在文革中被打倒，就是被毛认定为赫鲁晓夫式的人物。刘曾是党认定的毛的接班人。早在1961年，毛接见英国元帅蒙哥马利时，就明确对外宣布了。某些人认为文革没有发动的必要，借口就是：刘不是赫鲁晓夫那样的人，不会背叛毛，一切全是毛的多疑。但是，那些拼命对文革和毛进行妖魔化的人，却充份证明了自己是比赫鲁晓夫还卑鄙的小人，毛的判断并不是没有根据。这就是妖魔化文革的悖论所在。

## 二，反思文革的原因——私有化方案的破产

有人认为反思文革只是因为下岗工人本身失去工作，和部份知识分子对社会丑恶现象的不满；认为这些人的诉求仅仅局限于经济方面，工人仅仅是为了找到工作，文人只是叶公好龙。那么我可以告诉那些妖魔化文革的人，他们从根本上错了！

工人要找工作可以有各种各样的理由；文人可以在思想多元化的今天，随便选择一个什么样的怪龙去好，以标榜自己的特立独行，为什么偏偏会选择文革这个容易引起争议的话题呢？为什么不选择解放前去反思，为什么不选择三民主义或其它什么思想去反思呢？今天的经济现实必然与文革有着某种相似之处，才有可能联系起来。这个联系就是——私有化方案的破产。

发动文革的另一个原因就是，反对刘少奇的单干风。刘在文革前反对人民公社，鼓吹单干，被认为是懂经济的证据。后来，联产承包的实践，解决了农民的吃饭问题，也成了这种理论的依据。难道真的是这样吗？看看今天农民重新走向贫困，看看农村承包的经验推广到工厂后，今天企业不景气、工人下岗的结果。我们能说私有化方案成功了吗？难道人民公社和公有制真的就行不通，就是不懂经济的表现吗？人民公社不成功的根本问题到底在那里？毛认为是公有制本身没有问题，问题出在具体的执行者，问题出在公社的基层干部的官僚主义，欺上瞒下；而刘认为，公有制是冒进，只能进行私有化。到底他们两个人谁对呢？今天终于有了结果。农村联产承包的结果，虽然在一段时间内取得了效果，但是很快就被农村的基层官僚掠夺了。乱摊派、乱收费，加上农村基层干部的腐败挥霍，农民再次沦落到了贫困的边缘。在城市的国有企业中也一样，改革初期承包制、股份制的成果，很快就被企业基层干部的官僚主义掠夺了。任人唯亲，贪污腐败，侵吞国有资产，很快就把大批国有企业搞到了濒临破产的边缘。这一切能说明私有化方案成功吗？这一切恰恰证明了毛的分析是十分正确的：官僚主义才是问题的症结所在，不论是公有制，还是私有化，不解决基层干部的官僚主义问题，就什么事情也办不好。如何解决基层的官僚主义问题呢？毛的初衷也并非要搞文化大革命这样一个自下而上的群众运动，而是按照正常的自上而下的程序，搞了一个四清运动。刘由于认识上的差异，执行不力。加上基层的官僚主义者对此采取了消极抵抗的策略，搞了一个桃源经验。桃源经验的本质就是，问题出在基层官僚身上，板子却打在群众身上，打在了所谓地富反坏右身上。客观上制造了很多不必要的冤案，包庇了许多官僚主义的坏人。把反对官僚主义的“群众运动”，变成了官僚整别人的“运动群众”。也正是看到了这种情况，毛才得出“中央出了修正主义”的结论，决定发动了文革。

不坚信社会主义，把官僚主义造成的问题，说成是公有制的问题；不解决官僚主义的问题，反而大骂群众觉悟落后，这种官僚主义惯有的消极抵抗方式，今天同样能够见到。无论中央怎样三令五申减轻农民负担，依然变本加厉地盘剥农民。无论怎样强调搞好大中型国有企业，还是想一卖了之；借承包和股份制的机会，侵吞国有资产；将企业搞到濒临破产的边缘，还借工人下岗之机，大肆排斥异己、打击报复。不是想着解决公有制发展过程中遇到的困难，而是一遇到困难就想着私有化，甚至是人为地给公有制制造困难，为私有化提供“依据”。实践证明，私有化并不是灵丹妙药。正是私有化过程中暴露出来的问题，与文革前遇到的问题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才引发了对文革的反思。正是私有化方案的破产，正是重新发现了阻碍经济发展的真正原因是官僚主义，才证明了文革中对官僚主义和修正主义的正确认识。

反思文革，不是要文革那样的群众运动，更不是要批斗蹲牛棚那样的方式。反思文革就是要从私有化方案的失败，找出坚持公有制、坚持社会主义，防止官僚主

义和贪污腐败的民主方式。反思文革已经有了完备的理论基础，而不是象妖魔化文革的人所说的是什么“思想混乱”。

### 三，不能回到文革——阻碍政治体制改革的大棒

妖魔化文革的人可以分成两大类。其中一类是敌对分子，这些人妖魔化文革并不奇怪，他们对共产党的妖魔化是一贯的，妖魔化文革只是其中的一个环节。还有一些人，则只是针对文革这一个阶段进行妖魔化，这些人比较复杂，有的甚至是来自党内。这里不想对这些人的背景和动机进行分析，这里只想指出，“不能回到文革”的口号，客观上已经成为阻碍政治体制改革的大棒。

妖魔化文革的人，根本不顾社会主义理论的基本常识，将社会主义与“均富思想”、“大锅饭”等同起来，将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与“乌托邦”等同起来。将“按劳分配”的正当公平要求说成是“红眼病”。对于社会上存在的贫富分化和分配不公视而不见，只是轻描淡写地说一声“那不是主流”。这些人根本无视政治体制改革的滞后制约了经济发展这一基本事实，对于弱势群体提出的改变现状要求，一概扣上“想回到文革”，甚至是“想造反”的大帽子。

妖魔化文革的人，表面上坚决支持改革，事实上却回避改革遇到的障碍。官僚主义和民主制度的不配套，已经成为改革的障碍。但是谁要是敢触动这些障碍，他们就会抡起“均富思想”的大棒，祭起“反对文革”的大旗，予以坚决的打击。这些人维护的不是改革，而是维护其既得利益——在民主与法治不健全条件下得到的既得利益。这些人口口声声的“改革”，只是局限在经济体制改革，或者说是局限在“私有化”的范畴内。要想将改革推向深入，必须有政治体制改革配套，这就难免会触及到一些特权阶层的利益。这些人根本不顾政治改革与经济改革相辅相成的客观规律，这些人是地地道道的改革反对派。这些人内心十分清楚第二次文革不可能发生；他们十分清楚地知道，没有人能再象毛那样享有崇高威望，甚至能达到个人崇拜的程度；他们也十分清楚地知道，人民整体素质有了很大提高，民主与法治的观念深入人心，不可能再出现蹲牛棚和批斗那样的事情。但是他们还是十分起劲地妖魔化文革，这是为什么？因为这些人内心，有着强烈的高人一等的精英意识，他们要让人民永远背负着文革的沉重十字架，只有始终让别人有一种原罪感，他们才能维持凌驾于一般群众之上的优越感，他们才能气使颐指地对别人指手画脚。文革中要铲除的就是他们这种特权思想，所以他们无比惧怕。他们知道文革不会重现，但是他们知道人民的觉醒迟早要冲击他们的特权思想，他们是借妖魔化文革，打压群众的平等意识。

在一个民主平等的环境下，没有什么不能谈的，谈论任何一件事都要摆事实、讲道理。文革不是阳光灿烂的日子，也不是暗无天日的年代，在党《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对文革的定性只是“错误发动”，“被坏人利用”。而在妖魔化文革的人口中，文革却成了法西斯一样的“罪行”，而不只是什么“错误”。这些人要的，不是分析文革发生的原因，也不是防止再次发生的方法。他们要的是，一提文革，就不允许别人说话的效果。这才是妖魔化文革的“反科学反民主”本质。

### 四，忆苦思甜——蜻蜓吃尾巴一样的自残

是反思文革站到了党的对立面，还是妖魔化文革站到了党的对立面？到底是谁处于“打着红旗反红旗”的尴尬处境呢？妖魔化文革的人借口“红太阳的死去和党的基本路线的修正”，将党的基本路线从 79 年割裂开来。甚至为了突出改革的业绩，将改革开放以前的三十年变成“忆苦思甜”的对象。这些人真的是跟党站在一起，跟改革开放的路线站在一起吗？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其实早就预见到有人会借口批判文革，进而否定党的领导。为此，坚决地提出了四项基本原则。改革开放中无论政策怎样变，四项基本原则不能变。四项基本原则是贯穿前三十年和改革开放之后党的基本路线。人为地割裂新中国的历史，就是违背四项基本原则。那些妖魔化文革的人，口口声声地拥护改革，恰恰忘记了坚持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他们将改革开放变成了简单的私有化和走资本主义道路。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私有化和贪污腐败也不是社会主义。

妖魔化文革的人甚至还倒打一耙，把坚持社会主义的人说成是“拥护文革”，想用“拥护”和“反思”一词之差，掩盖其反社会主义的本质。事实上，恰恰是这些人，将公有制说成贪污腐败的根本原因，将按劳分配与大锅饭等同起来。这些人是从本质上否定社会主义，架空党的领导。试想，难道走资本主义私有化道路需要共产党的领导吗？如果不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共产党不但将失去执政的理论依据，甚至会失去存在的依据，就象前苏联那样。割裂新中国的历史，使其只剩下改革开放二十年后一段孤零零的历史，把这之前说成一片黑暗，好像不是共产党执政似的。这是十分危险的，这将使党失去政策调整的余地。党如果有一个贯穿新中国建设成就的辉煌历史，暂时的错误和失误是能取得人民谅解的，还有改正错误的机会。如果你只会干一件事，甚至以前总干坏事，一旦出现了失误或偏差，那你又凭什么要求别人再给你一个改正的机会呢？

中国面临的现实是严峻的。近几年经济上遇到的困难，加上今年乾旱、蝗虫等自然灾害。台海局势的紧张，万一开战，不论美国干预与否，经济制裁和封锁是难免的。这正象文革前，国内经济困难、自然灾害、外部封锁叠加在一起。党和人民随时要做好再过艰苦日子的准备。这就势必不能再单靠经济利益，将人民团结在党的周围，势必要重新高举毛主席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旗帜。如果现在丢掉这面旗帜，又如何使人民万众一心共渡难关呢？那些妖魔化文革的人是不会想到这些的。那些人只是利用共产党，只是利用共产党政策中对他们有利的部份，将这一部份无限夸大，与党的其它政策对立起来，割裂开来。对那些他们不喜欢的政策和历史，他们就极尽丑化歪曲之能事加以妖魔化，希望党按照他们的意愿一条道走到黑。他们是将共产党往死路上推。

## 五，文革的实质——文革还在以另一种方式继续

文革的实质是反对官僚主义。有人说发动文革是为了反腐败，这话并不准确，文革是为了铲除滋生腐败的土壤——官僚主义。这有两条依据。首先，当时的官僚主义还没有发展到腐败的程度，还只是体现在政治上的特权思想，经济上的特权思想还没有表现出来。其次，文革是针对“原因”而不是“现象”。文革前的四清运动可以说是针对官僚主义的现象，但却动失败了，遭到了官僚主义的消极抵抗。也正是因为如此，毛才发现了问题的严重性，才要从根本上，从体制上解决问题。



文革的愿望和判断是正确的。发展公有制过程中遇到的问题，不是公有制本身无法克服的问题，而是官僚主义造成的。解决的方法不能是私有化，而应该是铲除官僚主义、特权思想。如果不铲除官僚主义，即便是改革，官僚主义同样会使之走上贪污腐败的歧途。在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一遇到问题就对公有制失去信心，产生怀疑，就想着“退够”，走私有化的道路，实践证明这是行不通的。

文革解决问题的方式是错误的。文革采用了群众运动的方式，而不是民主建设的方式。这是那个时期的历史局限性造成的，我们不能要求60年代的人，有着和90年代人同样的民主思想。那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群众运动并没有达到铲除官僚主义的目的，文革失败了，毛最终也妥协了。毛当时是不可能找到比群众运动更好的“民主”方式了。今天的人民要幸运很多，人民可以有更好的民主方式选择。

文革中出现了很多愚昧和荒诞的行为，这成了妖魔化文革的法宝。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行为并不是文革中左派所特有的。看看妖魔化文革那些人的所作所为就知道了。“拥护文革”成了他们手中的大棒和帽子。什么“打着红旗反红旗”、“站到了中国共产党的对立面”、“残渣余孽”、“新纳粹”。这些人除了否定文革的正确“愿望”之外，继承了文革的一切错误“手段”。可想而知，文革中如果不是左派打倒了右派，而是右派取得了胜利，那些愚昧和荒诞的行为同样会在右派身上得到充份的表现。

历史是人民写的，但是只有他们认为对自己有利的时候才会承认，否则就会刀枪棍棒相加。只允许他们不顾事实地妖魔化文革，却不允许别人摆事实讲道理，不允许分析文革的原因，不允许别人讲文革的真相。文革的斗争还在继续。所不同的是，妖魔化文革的人继承了文革的错误方法，反思文革的人继承了对官僚主义的分析。不叫文革的文革迟早还会出现。

~~~~~

## 【往事追忆】

一九七六年合江纪事

• 多元 •

合江是四川的一个普通县份，位于赤水河和长江会合处。文革时，合江属宜宾地区。该地区十八个县市，合江以农业著称。那时自由市场物价飞涨。宜宾以下、重庆以上的沿江县市中，合江的肉、鸡、蛋等副食品最便宜，外地来往车船，多到此地购买。文革后期，四川学大寨，合江是宜宾地区唯一要“一年建成大寨县”的县份，当然，后来“大寨县”并没有建成。

一九七六年，我在合江县城当工人，妻子在农村当中学教师。九月十日下午，我正在乡下家里收听广播，突然，半导体收音机里传来中共中央关于毛泽东逝世的讣告。消息来得太突然，我吃了一惊。

我的邻居、六十多岁的“三代老贫农”叶老太爷正在我家与妻子聊天。我连忙告诉他这个消息。哪知他毫无反应。我以为他没听清楚，又重述一遍。他连脸也不转过来，一字一句地说：“毛泽东早就该死了！”

我吓了一跳。当时我虽然对文革和毛泽东的一些做法相当不满。但尚未达到盼望毛泽东早点死去的地步。叶老太爷这种话，如是在城市，被人告发，会被定为“现行反革命”，甚至可能被枪毙。我连忙说：“叶老太爷，话不能这么说。不过，毛主席死得太不是时候。”我的言外之意是，国内这么乱，毛泽东遽然去世，不知中国会发生什么变化。

叶老太爷说：“新社会还不如烂政府（指解放前的国民党政府）。烂政府时期，我帮地主当秋二（雇工），遇到农忙季节，犁田耙田，栽秧打谷，东家要把酒肉送到田边，天热了还给我打扇。现在的农业社（指生产队），我三个儿子是‘全劳力’（指青壮年男性农民，做一天农活，可以获得最高的十个或十二个工分），一年到头做活路，连包谷红苕都吃不饱。”我无言以对。

叶老太爷是道道地地的贫农，是共产党在农村的“依靠力量”，全家从未受过任何政治运动的迫害。他家的生活在当时的合江农村属于中等水平。他却盼望毛泽东早死。为什么？

以前叶老太爷曾对我讲过，“三年困难时期”，邓小平侄子邓自立在宜宾地区当地委书记，大搞刘少奇、邓小平的“三自一包”（自留地、自由市场、自负盈亏、包产到户），合江才少饿死许多人。

叶老太爷代表了当时中国农村的多少农民？我不能回答，因为没有做过系统调查。不过，据我观察，他对毛泽东的看法至少代表了当时四川的相当一部份农民。像叶老太爷那样对毛泽东深恶痛绝的人，城市里可能相对较少，因为城市的生活比农村要稍好一些。例如，我当时每月有四十多元工资，还可以国家牌价购买二十多斤粮食，半斤猪肉，三两菜油，半斤白糖。

而农民却没有任何副食品供应，吃肉全靠自己养猪。农民辛辛苦苦养一头猪，过年宰杀，一半猪肉必须以自由市场二分之一甚至三分之一的低价卖给政府，自己所得的一半要应付全家一年的肉食需要。农民种的粮食，除了上缴“公粮”和“征购粮”，还有五花八门的各种扣除，如“生产队提留”、“派购粮”、“救灾粮”、“战备粮”等等，剩下的才由生产队按照各户的工分总额分配。合江是产粮区，大部份农民，全年平均短缺一至两个月的口粮，每年三、四月间，青黄不接，要跑到少数富裕地区借高利贷，即春季借一斤连包谷芯在内的生包谷，秋天归还一斤稻谷。

那些年月，四川农民的日子之苦，受压迫之重，非在农村生活过的人不可想象。

再说几件小事。

妻子从农民那里听来一件事。一家农户：夫，妻及五岁独子。三、四月间，青黄不接，粮食已尽。夫至亲友家，高利贷借回一袋米。返家，不见妻，问子。子答：去外婆家借粮。夫把米放桌上，嘱子照看，出门追妻。邻人来其家，见米，说：

你爸叫我拿米，遂将米扛走。夫未追上妻，天色已晚，径自返家，不见米，问子，知为他人骗走，大怒，以脚踢子。子倒地，久不起。夫细视，已无呼吸，悔恨莫及，悬梁自尽。当晚，妻返家，夫死子亡，遂投塘而死。一袋米要了一家三条命。

我家附近的第七生产队，一户农民，自留地种红薯，年年被他人盗去不少。一九七五年十月，红薯成熟，为防盗，刨出红薯，以农药拌之，再埋土中。同队一户农民，夜来偷窃红薯，回家煮食，夫妻及四个子女，一家六口，全家死绝。

妻子爱清洁，每天把洗脸巾、擦脚布、擦桌布，洗得乾乾淨净，晾在屋内绳子上。妻子的舅舅是同一公社的农民。他所在的生产大队，主要产水稻，是全县最富裕的大队。有一次，舅妈来我家作客，错把擦桌布当洗脸巾拿来洗脸，被妻子纠正。舅妈大惊小怪，说：“你们家的擦桌布，比我家的洗脸巾还乾净。”邻居叶老太爷一家，十几口人，只有一条黑糊糊的旧毛巾。客人来了，拿不出一条新毛巾待客。

有一次，我陪妻子去一个学生家庭访问。该农民家的状况，可以用“家徒四壁”来形容。除两张破烂不堪的床、一张破旧木桌、两条旧长凳，几乎没有任何家具，也没有暖水瓶或搪瓷缸。学生父亲穿的破烂衣服，完全可以拿到当时的“阶级教育展览会”上当展品，显示“旧社会农民生活之苦”。

一九七六年，春节刚过，我工作单位的王姓同事，家属在农村。我询问其过年情况。答曰：今年养一条猪，缺少猪食，到年底，只长到八、九十斤，宰杀，廉价卖给公家一半，自己留一半。大年三十，家无一粒大米，买了几斤萝卜，连同一些猪肉，煮了一锅，总算过了个年。

同年六、七月间，合江县城街头，我见一个衣衫褴褛的中年农民坐在路边，旁边跪著一个五、六岁小女孩，衣服同样破烂不堪，头上插一草标（以稻草圈成圆圈，表示出售的物品）。地上铺一张纸，纸上写道（大意）：因无力养活亲生女儿，愿哪位好心人，做善事，出十元买去，终身无悔。

文革后期，四川在农村开展的“农业学大寨”运动，严重地挫伤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我出差坐火车，铁路沿线的大片田土，庄稼长得稀稀拉拉。唯有农民住房附近的一小块“自留地”，庄稼生长得格外茂密茁壮，与集体土地形成鲜明的对比。

七六年夏，我家所在生产队，中稻已经成熟，忽然吹了一夜大风，把稻子刮得东倒西歪，倒伏在水田里，如不抢收，稻谷会烂在田里。我看生产队毫无动静，急忙问叶老太爷。他冷淡地回答：“生产队土地多打十斤（粮食），我多分不到一两。自留地多打一斤（粮食），我就得一斤。操这个闲心干啥子。”

一九七五年，四川开始搞“计划生育”。农民的孕妇，纷纷逃到远处亲友家躲避。公社组织了“计划生育小分队”，十来个人，一、两条“汉阳造”或“老套筒”步枪，四处捉拿孕妇。如孕妇已逃走，小分队就驻守农民家，有猪宰猪，有米煮饭，每人每天算十个工分或一元钱，从农民身上扣除。农民多不堪忍受，只好把孕妇叫回来。小分队将孕妇捆绑，像准备宰杀的猪一样，以“滑竿”抬到公社或区卫

生院，“刮宫”或“引产”。一个在区卫生院工作的朋友告诉我，如引产下来的婴儿还是活的，医生的标准操作程序是，在婴儿脑顶注射一管盐水，婴儿就死亡。

四川是天府之国，农民生活如此困苦，许多农民不仅对毛泽东、共产党产生反感，有些农民还铤而走险，诉诸造反行动。这种造反，不是城市人搞文革运动的那种“奉旨造反”，而是货真价实地真造反，他们成立组织，搞武器，策划武装暴动，想推翻共产党的统治。

因工作关系，我经常到外地出差，前后走了至少二、三十个四川的县市，几乎都见到法院张贴的判刑布告。被判刑者主要是各种“反动组织”、“反革命集团”的头头，大多没写出身成份，我猜想，他们很可能出身贫下中农，因为如系地、富、反、坏、右五类分子，布告上必定会注明。这些组织的成员几乎全是农民，而且绝大多数是出身好的农民。我家所在生产队就有个叶姓青年农民，挑了一百斤稻谷去赤水县，加入一个“反革命组织”，据说有数百名成员，后来被公安机关破获，主要头头被枪毙。叶姓农民因出身贫农，在公社住了几天“学习班”，就被释放回家。

合江不少农民的思想“反动”，农村干部又如何？我有个朋友，是县粮食局一般干部，参加过农村工作队，他告诉我一件事。合江偏远地区有个公社，五个主要领导干部，多年来，几乎天天晚上定时收听台湾“敌台”广播。当然，我并不想“以点盖面”，说当时合江所有或大多数农村干部，都在反对毛泽东、共产党。

一九七六年一月，周恩来去世。北京等大城市的许多民众悲愤莫名，纷纷举行追悼活动，后来还出现“十里长街送总理”的感人场面。民众的感情是真挚的，因为这些活动并非官方组织。官方不仅不组织，还竭力阻挠。合江附近一家中央部属工厂，中层干部、知识分子和工人在礼堂自行举办追悼会。中途，工厂领导前来传达中央文件，下令停止追悼。一位工程师抱著麦克风嚎啕大哭，与会者无不为之动容。

然而，对周恩来之死，农村不必说，合江县城一般民众的反应似乎很淡漠。社会上流传着种种小道消息或谣言。二月间，一个中学同学告诉我，某古庙墙壁的夹层发现一本手抄明代古书，预言以后五百年中国政局变动，说今年中国要死皇帝。我不相信，说：周恩来只是宰相，毛泽东才是当今皇帝。

四月，北京发生天安门事件，邓小平再次被打倒。社会上流言满天飞。重庆钢铁公司有职工贴大字报，公开为邓小平鸣冤叫屈，“恶毒攻击”江青、张春桥等人，立即被抓起来批斗。

七月，朱德去世，唐山地震。邓小平家乡南充广安一带，大批农民手持生产队、大队甚至公社开的“介绍信”，到城市要饭。“介绍信”写道：持信者系贫下中农，由于遭灾，到外地逃荒要饭，希沿途党委、革委会接待为荷。重庆菜园坝火车站，警察把街上抓来的逃荒农民，押上火车遣送回乡。旁边有个重庆青年，对农民说，你喊一声“打倒邓小平”，我给你十元钱。农民摇头说“不”。

九月，毛泽东遽然去世。遵照上级指示，合江各个单位设灵堂，立遗像。居民不准办婚嫁、生日、丧事，不准唱歌。除了哀乐，不准播放音乐歌曲，包括样板戏。治丧期间，我到重庆出差，在电视上看见北京的追悼场面，许多城市居民，尤其是青少年学生，与毛泽东遗体告别，痛哭流涕。回到合江，我却看不到这种景象。街上行人，神情严肃，但无人流泪，似乎并不悲痛，至少没有自己亲人亡故的那种悲哀。听说合江中学，有学生在灵堂上痛哭，但我没有亲眼见到。

毛泽东去世的当月，合江及邻县江津一带的农村，农民纷纷传言：“毛泽东死了，要变天了。”不知从哪里吹来一股“单干妖风”。生产队纷纷把水田以外的旱田坡地，私分给各户农民栽种。我家附近的第四生产队，主要是旱田坡地，水田很少，集体土地几乎分光。十月，四人帮被抓，华国锋登基。十一月，中共中央召开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十二月，合江县委向农村派遣“学大寨工作队”，狠刹“单干妖风”。四队生产队长王某，复员退伍军人，立即被撤职，并被押送到各生产队，巡回批斗。两年后，邓小平上台，农村搞“联产承包责任制”，集体土地再次分给各户农民，这已是后话。

∞ ∞ ∞ ∞ ∞ ∞ ∞ ∞ ∞ ∞

难忘 1976：四人帮被揪出来了

• 季思聪 •

多事的 1976 年那年我高中毕业。

3 月 5 日那天，我们被敲锣打鼓地夹道欢送到延庆县永宁公社太平街大队插队落户，在这里经历了大地震、毛主席逝世、和“揪出四人帮”。

延庆县因有八达岭和长城当时已被划归北京市。我们这里离北京城只有三小时长途汽车的路程，每天有两、三班车可以回城，车站就在从我们宿舍步行五分钟的街口上。生产队对知青挺不错，不少老乡对我们的生活起居也是多方照应，北方的农活对于年轻人来说一般吃得消，知青又有自己的伙房，不用象当地农民那样，收了工还要辛辛苦苦自己烧火做饭、喂猪垫圈的。所以这样的插队生活，和当年去东北、内蒙、延安、云南的知青相比，实在已经谈不上任何艰苦。

很多老乡也是知书达理、见过世面的，与知青们很谈得来。队里的两个老党员，是抗美援朝复员军人，当年四、五十岁，但看上去要苍老许多。他们的生活也和其他人一样，拖儿带女，辛苦劳作；但他们毕竟是有过些经历，精神境界终究是有些不同的。当年盛行“传达文件”，往往先党员后群众，每当大喇叭里一叫“今天晚上，党员到队部开会”，就显出他们的不同来了——别人收了工赶快回家做饭吃饭，喂猪喂兔，忙活自留地，他们却集中到队办公室去开会。

这一天，老党员宋长有来知青点串门。不记得是怎么开始的，他谈起了刚听完了只传达到党员的中央文件，一脸严肃地说：“中央又揪出四个人来”。他用的那个“又”字我记得很清楚，大概他觉得和“刘邓陶”“彭罗陆杨”“王关戚”“杨余傅”的一一被揪出是一回事。自从林彪被“揪出来”以后，已经好多年没有再揪出什么人来了，我当时再想不出还有什么人可以被“揪出来”。不料，老宋点出的

第一个名字竟是“江青”！我脑子刷地一亮，除了震惊之外，我感到了这次可不是个“又”的问题了。

其实我一贯并没有太多的“反骨”。文革之初我刚上小学，到这会高中毕业，所受的全是文革的教育，什么大批判、游行、办学习班、“拉练”、插队，没有一件事是自己想干的，可只能乖乖地去干已成天经地义。对报纸上说的一切当然全不相信，但对于一切必须那么说却是习惯成自然。虽然反四人帮在当时早已是暗潮汹涌，可我本人的“觉悟”并不特别高——“四五”天安门事件的时候我们已经在乡下了，没有亲历，从在城里的同学们的嘴里能听到的，不过是一些侧面情况，小道消息，顶多是隐隐约约的感觉，并没有很清醒地认为应该、也可能推翻个什么。现在，“江青被揪出来了”这句话，让我突然之间一切蒙昧都开了窍——这回可是要翻天了！

我们几个女生马上追问：“还有谁？”他说“还有姚文元”。我竟接口说“是不是还有张春桥？”一分钟前我都不可能有这个灵感。答案是“对！”我激动得头直晕，“这回真的要变天了！”虽然老宋想不起来第四个人了，但不要紧，只要这三个被“揪出来”，再揪谁再不揪谁都差不多。

“揪出”林彪的时候已不兴上街敲锣打鼓欢庆胜利了，可这一次又是从城到乡大街小巷游行的一片海洋，我们大队也组织去游。不知别人怎样，反正我这是第一次真心高兴地又游又嚷。看见横幅标语上的口号“打倒四人帮”时，我想的是“四人帮这个词该成为常用词了”，果然直到现在还用呢。

秋收后回到北京探亲。北京市民为这件大事的终于发生而欢天喜地一片欢腾，人人的高兴、痛快、解恨之情千姿百态溢于言表。西单菜市场在卖活螃蟹，有人称“给我三只公的一只母的”，引得不少人喝彩和效法，一时传为笑谈，听说售货员就干脆把三公一母挂在一起，人手一份。

四人帮倒了，一群受他们宠的人也跟着倒。北京人天生嘴巴尖刻，这时候继承了四五天安门诗抄的传统，大兴特兴写旧体诗来抒发自己的开心和解气。一大堆不知名的作者写了一大堆满江红西江月十六字令水调歌头什么的，讽刺嘲弄“四人帮”及其“爪牙”的台上台下。那些诗写得又贴切又压韵，妙语连珠，好多都比郭沫若那首被谱成豫剧、让常香玉唱得痛快淋漓的“大快人心事”要精彩得多，我看得乐不可支。当时尚不知有复印机，想自己留一份的话全靠手抄，我又是个急脾气，往往新诗一到手，就等不得过夜地立即赶抄，通宵的时候都有。抄完也拿给别的同学看，很出了点小风头。

很快，一些老演员、歌唱家纷纷登台，把他们当年风靡全国的拿手戏重新唱起。虽然他们人老了，丑了，可是那些久违了的曲调和他们当年的风采都让人目不暇接，激动得透不过气来。“久旱的禾苗逢甘霖”，那些歌曲于是结结实实地渗透进我的每一个细胞，直至今天还是我情感中的最终极偏爱，不论多高兴或多不高兴，听它们都是永远少不了的一个项目。

第二年夏季左右，在国家教委工作的父母告诉我，从今年起要恢复高考了，各

种全国统一高考的准备工作正在紧急筹备，因秋季入学来不及，将在冬季考试，推迟半年到明年春季开学。我马上把消息告诉所有知青，引得群情振奋，我于是又出了点小风头，成了个咨询站。大家随即投入了复习备考，不少人（也有我）后来成为响亮的“77级”中的一员。

~~~~~

## 【史海钩沉】

### “周总理遗言”案

• 佚名 •

李君旭——这位在一九七六年编造了“周恩来总理遗言”且轰动国内外的青年，当时只是杭州汽轮机厂的一名普通工人，才二十三岁。

那年的冬天，中国大地因为周恩来的去世而显得格外寒冷、漫长。一天晚上，李君旭参加了几个朋友的“聚餐”后，便陷入了冥思苦想。刚才，几杯热酒下肚，几个热血男儿便“指点江山”起来。

“周总理的遗嘱，就是骨灰撒掉这一句话吗？”

“肯定还有什么话被人封锁了！”

“我们不能再这样下去了，得行动起来，继承总理未竟事业。”

“对，得行动起来！”李君旭冷静地思考着，而他的血则在沸腾在燃烧。他觉得，自己应该写一篇文章。

他展开稿纸，提笔开了几个开头，都不满意。他猛地推开北窗，任风夹着细雪扑面而来。突然，他脑海中掠过一道闪电……

啊，灵感！

遗言！就以周恩来的口气，写一封诀别书！由于高度的兴奋，李君旭的胸口在刹那间感到一阵窒息。

此后，李君旭开始为“遗言”作准备了。他阅读了许多有关人士的回忆录，收集周恩来的生平资料。

春节刚过，厂区里显得冷冷清清，他呆在宿舍里，乘无人之际，抽出了早已准备好的十六开记录纸。

《周恩来遗言》就在这间斗室中问世了。它像核反应堆，向四面八方放射着巨大的能量。

遗言故意借用过去的资料以求更加真实可信——

主席、中央：

我自第二次手术以来，病情有短期稳定。从下半年开始，癌症已广泛扩散，虽然自觉尚好，但离去见马克思的日子确实不太远了。我想，有必要向主席、中央汇报一下近来的一些想法。

患病期间，主席对我亲切关怀，使我很感动。主席年龄大了，要注意身体。有主席为我党和国家掌舵，是全国人民莫大的幸福，也是我莫大的欣慰。这些日子，主席在遵义会议时和我的谈话总是历历在目，百感交集。不能为主席分担一些工作，我十分难过。为了我们祖国和人民的前途，主席一定要保重。

.....

朱德同志和叶剑英同志年事已高，要多锻炼身体，当好主席的参谋，具体分工是可以摆脱的。但是，他们的地位是举足轻重的。我们这一辈人，跟主席那么多年了，更要以高昂的战斗精神，保持晚节。

小平同志一年来几方面工作都很好，特别是关于贯彻主席的三项指示，抓得比较坚决，这充分证明了主席判断的正确。要保持那么一股劲，要多请示主席，多关心同志，多承担责任。今后小平同志压力更大，但只要路线正确，什么困难都会克服的。

.....同志们，长期以来的病假，使我有机会回顾自己所走过的路。在这段曲折的路上，我永远不能忘怀那些在我们面前倒下的先烈。

我们是幸存者，一九二六年和恽代英同志分别时，他说：“当中国人民都过上幸福生活的时候，我们能活着的人，一定要到死去的同志的墓前，去告慰他们，死者会听到我们的声音的。”我总想着用什么来向他们汇报呢.....在弥留之际，回忆先烈的遗言，对照我们人民的生活条件，我为自己未能多做一点工作而感到内疚。.....展望本世纪把我国建成一个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现代化强国的壮丽前景，我充满了必胜的信心。死，对于共产党员来说算不了什么，因为我们把生命交给了人民的事业，而人民的事业是永存的。唯一遗憾的是我再也不能和同志们一起前进、加倍工作、为人民服务了。同志们，一定要把党和人民的利益放在一切之上，在毛泽东的领导下，团结起来，争取最大的胜利。

关于我的后事，我向中央请示：一，将我的病情告诉全国，以免引起不必要的猜测。二，追悼会主席不要参加，应力求简单，请小平同志致悼词。骨灰不要保存。撒掉。

.....

遗言的出现成为轰动的新闻，立即引起有关部门的重视。

《遗言》一问世，各地很快出现了数以万计的抄本，而且，世界各国一百三十多个电台、通讯社播发了它。



《遗言》为不久之后即告开始的“四五”运动作了重要的舆论准备。它是向所谓“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宣战的檄文。在十年“文革”史上，《遗言》有其特殊的地位。

四月五日，“天安门事件”爆发。《遗言》作为“头号反革命事件”受到追查。

五月五日，一辆绿色的中吉普车开进杭州汽轮机厂。四个公安人员带走了在做工的李君旭。他从此成了“重大政治犯”，被投入了监牢。

五月底，他被秘密押送到北京，单独监禁。

“那十八个月，我失去了自由。我被关押在北京的某个地方，这个地方至今我仍不知是哪里。”他当时不被人叫名字，而是叫做“六十三号”。

“监护所”是一幢两层楼的房子。房子的北面是一片菜地，是执行看守任务的部队战士种的。菜地后面有内外两道墙，墙上有铁丝网。

两道墙之间，又被七、八堵短墙分割成一块块小空间，这便是李君旭以及其他以数字命名的人的“活动”空间。

他们每天“活动”的时间是四十五分钟。

他是被单独“监护”的，他的房间不大，但屋顶特高，上面有一只白炽灯，每天晚上开着，这常常使他无法入睡。医生怕他这样下去支撑不了几天，就给他吃安眠药。给他药时，医生将它挤压成粉状，交给他并看着他吃完后才离去。医生是怕他把安眠药积攒起来用来自杀。

后来，吃安眠药也不能解决问题了，在被关押的日子里，君旭常常彻夜难眠。

这单独“监护”真够厉害的，除了所谓的“专案组”到时来审讯，每天他与人说不了几句话。

房间里的窗户不但关着，还糊上纸，他能看到的只是空荡荡的四壁和一张《人民日报》。孤独、烦躁和恐惧感，以及被人遗忘感，无时无刻不在折磨着他。

他尝到了茨威格小说《象棋的故事》中主人公被单独监禁时精神崩溃的滋味。那位主人公最后是靠一本讲解象棋的书战胜了精神崩溃，而他能够靠什么？

君旭从小对地图特别感兴趣，捧着地图一看就是半天，梦想自己是一个旅行家，到北美、到南非……

于是，他利用《人民日报》，在国际版上找到了一个国家的名称后，立即去想它的首都是什么名字，以及这个国家的版图是什么样的，然后画在报上，标上首都

，再自作主张地上面兴建城市、铁路、港口……

这倒也让他忙碌了一阵子，打发掉不少时间。

他后来向“监护所”当局再三请求，对方终于恩准，给他送来了一套《列宁选集》，从此，神游世界和研读马列，使他再无“精神崩溃”之忧了。有一次，“专案组”又来找他。审讯是在一辆客车中进行的。他觉得特别好笑。“你笑什么？唐山都大地震了，你还幸灾乐祸？！”审讯员要先杀杀他的“态度”，“地震那晚，你为什么起来又躺下？”

“我又出不去，不躺下干什么？”他回答：“死了倒好了！”

“什么？你盼着房子都倒掉？你想让那么多革命战士陪着你死？！”对方吼道。

“我想我死了，你们也可少些麻烦。”

再后来，他只觉得他们七嘴八舌地问这问那，不外乎旧调重弹，什么“你的后台是谁”？“你的行为究竟是谁指使的”？他对此反感极了，一律不加理睬，回到房间后，他只顾想一些让人心平气和的事，慢慢便睡去……

一九七七年十一月，李君旭获得了自由。到了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他的事情得到了平反。

□ 摘自《美洲文汇》第七十三期

---

本期编辑：                    华新民（美 国）                    〈cnd-cm@cnd.org〉

---